

作为印刷和创新资助人的藏族妇女^{*}

玉珠措姆 海德噶·丁伯格

内容摘要：在以往有关贡塘公主曲吉准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一些更广阔的妇女网络，在这些网络中，妇女充当古籍印刷的赞助者，而且更普遍的是进行社会和文化的革新活动。这些妇女中包括许多不知名的或名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以及藏弄·黑如噶的著名明妃衮都桑姆。尽管在这些卓越非凡的妇女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妇女都没有专门记述其生平的传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认真地分析和对比大量的历史资料，来确认她们中许多人的身份。这类研究显示，在文化生产中妇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叙事中很少全面地反映她们的事迹。从这点而言，在青藏高原上发生的某些事情的进程与同时代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发生的进程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

导论

在书籍的制作和出版中女性佛教徒的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将印刷作为一种技术创新手段的引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她们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在

* 本文是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暨四川大学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项目研究成果，并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建设计划资助。

历史上，公元一千年时，印度帕拉王朝的一位王妃¹资助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和《五护陀罗尼》；中国唐朝的武则天（690–705年执政）²也被认为是“发现印刷”的女皇；8世纪日本女天皇称德（又称孝谦天皇）曾赞助印刷事业³。此外，13和14世纪元朝宫廷的皇后们也资助印刷藏传佛教经文⁴，还出现了无数以各种身份为出版藏族传统文学名著做出贡献的藏族妇女。本文主要探讨15和16世纪藏族妇女对印刷书籍所做的贡献，并将她们与赞助印刷的欧洲妇女进行比较。

曲吉准玛（ཆོས་ཀྱི་ཚུན་ལྷ 1422–1455年）和衮都桑姆（ཀླུང་ཀྱི་བཞེད·ཚེ 1464–1549年）是在那个时代推动藏族社会文化创新最突出的例子。在她们的许多宗教和艺术成就中，其支持的一些新技术印刷项目，为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提供了可以阅读的文字材料。她们两人都通过放弃婚姻或拒绝结婚，对社会传统习俗提出了挑战，都成为了杰出的宗教上师的弟子及伴侣，且最终她们自己也成为了重要的宗教人物。其弟子们为其撰写的传记，为我们了解她们的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通过阅读有关宗教大师们早期出版物和传记的题记，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妇女作为施主，参与了书籍的制作过程。笔者将探讨包括上述两位著名妇女和一批相互关系密切的妇女，在推动南部拉堆（ລາວ ລັບ ເຊີນ）和贡塘（ກອນ ດັບ）地区早期印刷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些妇女是当地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的一部分。通过分析从已知的和新近发现资料中所能搜集到的相关信息，探讨导致她们推动印刷事业以及广泛的其他文化事业的理想、限制以及环境。也将探讨这些妇女常常处于其世俗责任与精神追求的矛盾困境中，最终她们成为了后世人们认可的典范和追随的对象。最后，在藏族社会语境范围之外，将探讨跨文化的妇女资助书籍制作和出版事业的类似现象，特别是探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妇女的诸多相关活动，可能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Camillo A. Fromigatti, "The Illuminated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Hildegard Diemberger, Mark Elliot, Michela Clemente eds., *Buddha's Word — The Life of Books in Tibet and Beyond*, Cambridge: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3: 12-13.

2 T. H. Barret, *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76.

3 Peter Kornicki, "Empress Shōtoku as a Sponsor of Printing." In Hildegard Diemberger, Franz-Karl Ehrhard, Peter Kornicki eds.,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Leiden: Brill, 2016: 45-50.

4 Kawa Sherab Sangpo, "Mongolian Female Rulers as Patrons of Tibetan Printing at the Yuan Court: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s." In Hildegard Diemberger, Franz-Karl Ehrhard, Peter Kornicki eds.,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38-44.

作为诸多宗教和政治网络一部分的藏族妇女

1407 年在协噶（ဆྙ རྒྱା）印制的典籍，是卫藏地区现存最早的，但没有明确提到作为施主或发起者的任何妇女。该文本是由南部拉堆的统治者拉赞加（ଲ୍ହା ସର୍ତ୍ତ ଶୁନ୍ଦା）赞助印制的，这是为其父王司徒·曲吉仁青（ସି ସୁଂ କ୍ଷଣ ଶ୍ରୀ ରିନ୍ କ୍ଷଣ ? —1402 年）举行的一系列葬礼活动的一部分。但是，在该文本的题记中，有几行不同寻常的赞词是赞颂其妻子赞江杰姆（ସର୍ତ୍ତ ଜୁମା ତୁଲ୍ଯା ଶ୍ରୀ），即南部拉堆的王后的⁵：

统治无边领土的至高无上的王后，像月亮那样 [提供] 源源不断快乐的甘露。拥有女神般美貌的王后成为了女性统治者，根据佛法来保护 [世俗和宗教] 团体。⁶

这些诗句没有清楚地说明她到底在该典籍的印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正如藏族社会中精英分子常常参与书籍的印制过程那样，她很可能参与了赞助该典籍印制的诸项活动⁷，但是在上述题记中，主要将她作为一个王后，而不是一个施主来赞颂的。那时她还很年轻，她与拉赞加成婚一定是在完成该典籍印制前进行的。

统治者们出资印制的典籍通常都附有题记，题记常常赞颂整个领地以及包括统治者的祖先在内的统治家族。赞助典籍的印制活动，是统治者们展示其作为佛教统治者的权

5 赞江杰姆生于 1393 年，是北部拉堆的统治者朗杰扎桑（ଇମା କୁମାର ଲା ଶୋଟ）的姐姐，她也是司徒·拉赞交的妻子。K. H. Everding and D. D. Dzongphugpa, *Das tibetische Fürstentum La stod lHo (um 1265–1642). Die Geschichte der Herrschaftsbildung nebst einer Edition der Chronik Shel dkar chos 'byung*. Reichert Verlag: Wiesbaden, 2006: 105-106. 她在曲吉准玛的传记中作为其婆婆反复地出现。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118-119, 124-125, 159-161, 163-166, 171. 在印制上述典籍时，她才 14 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与其说这些诗句是赞颂其实际行动，不如说是赞美其预期角色的。

6 ଶେଲ ଦକ ଚୋ ବ୍ୟାପି କୁମାର ଲା ଶୋଟ କାର୍ଯ୍ୟ ଶ୍ରୀ ପୁନଃ ଦେଖିବା ଅବଶ୍ୟକ ନାହିଁ । ଶେଲ ଦକ ଚୋ ବ୍ୟାପି କୁମାର ଲା ଶୋଟ କାର୍ଯ୍ୟ ଶ୍ରୀ ପୁନଃ ଦେଖିବା ଅବଶ୍ୟକ ନାହିଁ । ଶେଲ ଦକ ଚୋ ବ୍ୟାପି କୁମାର ଲା ଶୋଟ କାର୍ଯ୍ୟ ଶ୍ରୀ ପୁନଃ ଦେଖିବା ଅବଶ୍ୟକ ନାହିଁ । 2013: 89b. 该文本的手抄本的题目为：ଚରିତ୍ରାନ୍ତର ଶ୍ରୀ ପୁନଃ ଦେଖିବା ଅବଶ୍ୟକ ନାହିଁ । 2009: 301, 303. 藏文原文为：ସର୍ତ୍ତ ଜୁମା ତୁଲ୍ଯା ଶ୍ରୀ ପୁନଃ ଦେଖିବା ଅବଶ୍ୟକ ନାହିଁ । ଶେଲ ଦକ ଚୋ ବ୍ୟାପି କୁମାର ଲା ଶୋଟ କାର୍ଯ୍ୟ ଶ୍ରୀ ପୁନଃ ଦେଖିବା ଅବଶ୍ୟକ ନାହିଁ ।

7 自吐蕃时代起，女性作为佛教施主已经是在西藏根深蒂固的做法。在蒙古妇女精英代表中较为流行的支持印刷的传统也可能对藏族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在对藏文典籍印刷进行赞助的蒙古女性中，有一位是妥欢帖木尔的妻子布鲁甘，而前者给司徒·曲吉仁钦授予了印信和名号。她是元廷中藏文典籍及将这些典籍发行到西藏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参见 Kawa Sherab Sangpo, "Mongolian Female Rulers as Patrons of Tibetan Printing at the Yuan Court: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s." 2016: 38-44.

力与威望的行为，他们间往往相互竞争，并竞相模仿像元代强大皇帝们那样的榜样⁸。上述题记概述了统治家族一位女性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她出生于北部拉堆（བླାତ୍ତେ རୋଗ）的统治家族，然后嫁到了南部拉堆的统治家族⁹。尽管通常男性统治领地，而妇女常常通过婚姻联盟，来充当一个政体和另一政体间的特使和调停人。当她们参与到最普遍的从父居的婚姻时¹⁰，通过依靠其亲属关系网络，可以与其娘家和婆家商讨相关事宜。因此，她们成为了婚姻联盟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正是婚姻联盟将一系列相互竞争，且常常被世仇和冲突弄得分崩离析的政体维系在一起。另外，当同一个政体内的诸多统治家族因各种矛盾而闹分裂时，她们也成为家族内部的调停人。

这些妇女参与活动的 15、16 世纪的政治结构，是由大量政体组成的，它们间有不同程度的从属关系、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格局，以及不断变化的忠诚方式。虽然与贡塘和北部拉堆一样，南部拉堆先前处于萨迦的统治之下，后来归属于帕木竹巴的统治之下，但它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早期其统治家族出现了一些伟大的萨迦本钦（សាស្ត្រពុជកេន្ទ）¹¹，也与元朝和后来的明朝皇帝们有直接的往来¹²。同时，像察达德巴（កែចាបត្រិយ）这样的地方统治者是南部拉堆“王国”的臣民，但他们拥有较大的自主权，统治着相当于今聂

⁸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Bo dong phyogs las rnam rgyal (1376–1451) and his Disciples as Producers of Manuscript and Print Editions."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237–266; Hildegard Diemberger, "Early Tibetan Printing in Southern La stod: Remarks on a 1407 Print Produced at Shel dkar." In Orna Almogi ed., *Tibetan Manuscript and Xylograph Traditions: the Written Word and its Media within the Tibetan Culture Sphere*, Hamburg: 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Tibetan Studies, Universität Hamburg, 2016: 105–125.

⁹ 赞江杰姆是北部拉堆与南部拉堆间建立的长期婚姻联盟的一部分，在海德噶·丁伯格 2007 年的著作中，谈到了作为曲吉准玛的婆婆的她。参见 Hidegå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emo of Tibet*, 2007: 10, 118-119, 124-125, 159-161, 163-166, 171.

¹⁰ 从夫居婚姻是预期的标准婚姻模式，而且也是最有名的。然而，这并不排除其他各种婚姻形式的存在。

11 Luciano Petech,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u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LXV.,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0: 1-168 ; Ngag dbang skal ldan rgya mtsho: *Shel dkar chos 'byung: History of the "White Crystal" : Religion and Politics of Southern La stod*, Pasang Wangdu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trans., in cooperation with Guntram Hazod,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6; K. H. Everding and D. D. Dzongphugpa, *Das tibetische Fürstentum La stod lHo (um 1265–1642). Die Geschichte der Herrschaftsbildung nebst einer Edition der Chronik Shel dkar chos 'byung*, 2006.

12 根据《协噶教法史》(*Shel dkar chos 'byung*, 1996: 7), 司徒·曲吉仁钦从元朝皇帝妥欢帖木尔(元惠宗)处得到了其名号, 后者的妻子是藏文典籍印刷的热心支持者。明朝的皇帝们(チベット語: རྒྱତ୍ତ རྩୋ རྣ୍ଗ རྒྱତ୍ତ རྩୋ རྒྱତ୍ତ རྩୋ)被认为是杂日(チベット語: རྒྱତ୍ତ རྩୋ)神山上所建的佛教寺院遥远的施主。参见 *Shel dkar chos 'byung History of the "White Crystal": Religion and Politics of Southern La stod*, 1996: 31b-32a。在 1413 年, 拉赞交得到了藏文典籍印刷最大的支持者明永乐皇帝颁发的一道谕旨, 该谕旨目前藏于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这些政治联系表明有一些文化网络, 在不同的时期可能通过发行印刷的藏文典籍以及推行相关做法, 以促进印刷技术的传播。

拉木县（གླାମ）的大片地域。他们也与邻近的贡塘“国王”们有直接的联系。苏措（སྡོ་ཚྩེ）以及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也是类似的情况。简言之，在1407年印制的典籍的后记中提到¹³，“像星星一样众多的政体”尊敬南部拉堆这一权力中心¹⁴，这可以被理解为反映了杰弗瑞·萨缪尔所描述的“星际”政体的模式，萨缪尔将谭拜亚的相关观念应用于藏族社会的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联盟就会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精英妇女的娘家和婆家都希望她们能够扮演相应角色。然而，有些妇女不乐于或不满意扮演这种角色，立志于全身心地追求精神生活。一般在结婚时，她们的上述想法和期望就开始出现了，通常会引起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和冲突。有时，她们在反叛后将自己的角色调整为宗教女性。有时她们将其世俗和出世间的义务和追求结合起来。她们对无法选择的婚姻进行抗争，将其与给寺院“扎仓”、尼姑院、典籍印刷项目的经济支持和自身的精神追求以及对书籍的热爱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处于上层社会的藏族妇女所过的生活，与同时代欧洲妇女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

西藏社会中，女性出家为尼不仅是她们实现其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拒绝结婚，决定自己生活的认可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精神 / 宗教力量有益于有政治地位的妇女地位的认可。在贡塘历史上，13 世纪的统治者拉仁青措（བླାନ୍ རୈକ୍ གୋଁ）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于政治动乱之时作为摄政接管了对贡塘的统治，而且其统治十分成功，为其侄子崩德衮纳波（ଘୁର୍ବା བେଙ୍ གୋଁ ອେଣ୍ ສ୍ତ୍ରୀ 1253–1280 年）最终建立芒域贡塘（ମାନ୍ୟ ସୁନ୍ଦରିନାଥ）“王国”奠定了基础，当时建立的“王国”对随后几个世纪该地区的历史都有重要影响。作为一名尼姑，拉仁青措备受人们的尊崇。在其任摄政期间，在一个专用的作坊中印制了被称为“多芒系列”（ମାନ୍ୟ ଶାନ୍ତିନାଥ）的佛教经典¹⁵。

俗人妇女如果赞助上述活动以完成其精神追求，会被人们高度赞许，成为被社会认可的一个有效途径，这样她们无需放弃其世俗的责任与义务，不需要面对出家为尼所带来的挑战。

各种典籍和传记后面所附的题记，能够给我们提供有关当时政治和宗教关系网络的一些情况，在这些网络中妇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她们是创新者，但更多时候只是遵循既定的仪礼而已。笔者认为妇女对推进印刷事业的贡献，与当时社会、政治

¹⁵ བୈଣ-ଇନ୍ଦ୍ରିକ-ଦ୍ୱାରା ଶୁଣାଇଥିଲା ତଥା ମହାକାଵ୍ୟ ପାଠକାରୀଙ୍କ ମଧ୍ୟ ଅଛି । 1990: 3a-3b. K.H.Everding, *Das Koenigreich Mangyul Gung thang*, 2006: 54-59.

结构期望她们所扮演的角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高度个人化的女性经历，反映了遵从和违背社会期望的结果。这些妇女生活的轨迹往往是非常曲折的，但很少有传记能够使我们了解到她们生活中的细节。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靠一些零星且非常少的信息来探讨妇女生活。在这一方面，她们与中世纪欧洲的女赞助人非常相似，有关她们的生活及事迹只能从信件、祈祷书和她们自己机构的少量文件中搜集到一些相关信息。

达姆南卡桑姆 (དமྱ ན ཀ ཟ མ 15 世纪)：尼姑兼女性统治者

一部最近发现的雕版印刷典籍显示，大约在 1442 年，苏措的女统治者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印制和出版玻东·确勒朗杰 (བୋ ད ག ར ས ཉ ཁ ཤ བ ང 1376–1451 年) 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ད བ མ ན ད ལ ཕ ཉ ཁ ཤ བ ང ད བ མ ན ད ལ ཕ ཉ ཁ ཤ བ ང)，这是后者的题为《显密典籍荟萃》(ད བ མ ན ད ལ ཕ ཉ ཁ ཤ བ ང) 著作的精要部分¹⁶。根据这部著作的后记，她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尼姑，被尊称为“洛本玛”(བ ཉ ཁ ཤ བ ང 意为女规范师)。为了给过世的苏措统治者仲钦·索南坚赞 (ཚ ད ག ན ད ལ ཕ ཉ ཁ ཤ བ ང) 以及其他一些官员积累福德，资助了上述印制和出版项目¹⁷。她是仲钦·索南坚赞的亲戚，与后者一样，均来自伟大译师邦洛扎瓦 (ད བ མ ན ད ལ ཕ) 世系，当时和后来该世系控制着南部拉堆的苏措地区。她对仅将经文作为尊奉对象的作法持批评态度，更加注重推动人们缜密地了解经文，尤其是有关密宗经典的内容和含义。她想通过印制和出版玻东·确勒朗杰于 1441 年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即《显密典籍精要荟萃》来达到促使人们了解经文含义的目的。在该著作的后记中，她因其精神素质和远见卓识而备受赞誉，她不仅是作为一个赞助者来参与该项目，而且也是该项目的发起者以及促使该项目圆满完成的推动者。

该著作的后记译文如下（在下文中特别重要的段落以加粗字标出）：

顶礼膜拜三宝！《精要》的目录包括所有三世佛陀所讲授的显宗和密宗的三重学科，以实现利益三界众生的卓越目标。由于以往珍贵的班智达和译师以完美的方式翻译了浩如烟海的佛法，哲学乘（指显宗经典）的纯正教义得以广泛地发展；相反，密乘的纯正教义则未能相应地发展。显宗经典也没有被正确

16 就玻东·确勒朗杰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的印制和出版时间，参看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17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地阐释，其含义被颠覆，而且造成了对这些经典的疑问。考虑到 [过去的] 错误，[现在] 的准确阐释阐明了佛宝的旗帜。就浩如烟海的密宗经典而言，曾出现了三、四次教授和修习密宗的热潮。然而，有关四续部的宝贵经典已大多成为人们顶礼膜拜以及进行仪式供养的对象。考虑到这个问题，由于对内、外佛陀的祈祷以及他们的加持，《显密典籍精要荟萃》以完美的方式阐释 84,000 法蕴，为了实施修习的精要，从《显密典籍荟萃》中摘录相关段落编辑成《显密典籍精要荟萃》(即该文集的精要部分浓缩为一篇文章)。该文比所有如意宝都还要殊胜，能够圆满地实现所有众生的愿望。在整个世界的四大部洲中，最殊胜的是 [人居住的] 豚部洲。在所有的国家中，最优秀的是雪域。在所有的神灵中，最杰出的是“藏吉拉 (意为“藏”的神灵)”[即苏措的山神]。该神灵所在的地方是金杰宗 (རྩེ་རྩེ་རྩེ) 的日拉日莫 (ଁ· རྩེ· །). 在这里出现了像如意宝树一样的一个世系，其根基非常的牢固，而且其顶部直达云霄。在这个像年轻的水晶枝一样积累福德的地方，出现了身着像果实颜色一样的赤黄色 [衣袍] 的女规范师南卡贝桑姆 (དླྷ ཀ བ ཉ ཁ ཉ ཉ ཉ ཉ ཉ). 她拥有无边无际的浩如烟海的财富，有与空中的繁星一样众多的随从，还积累了像日月一样美丽耀眼的两种资粮，从而成为了所有人尊崇的对象。作为照亮生死轮回苦海的黑暗以及增加利乐的一种方式，她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冥想。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无数的日月都不能与《显密典籍精要荟萃》媲美，意欲运用其所有的资源来宣传它。通常为了帮助众生获得解脱，并为了实现已故的官员们，特别是珠钦·索南坚赞 (ལྷ ང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的遗愿，即帮助他们成佛，她印制了该典籍。该典籍的木制印版是由年扎桑布 (ལྷ ང ཉ ཉ ཉ ཉ ཉ) 大师提供的。印制的该典籍就像日月曼陀罗一样，其无限的光芒通过技艺精湛的抄经师南喀仁青 (དླ ཉ ཉ ཉ ཉ ཉ) 以及诸如格西嘉勒 (དྷ ཉ ཉ ཉ ཉ ཉ)、桑巴洛珠僧格 (དྷ ཉ ཉ ཉ ཉ ཉ) 等熟练的雕工之手，得以广为传播。像遮蔽日月的灰尘、像 [遮住天空的] 云彩、像 [通过制造月食来遮蔽天空的] 罗睺罗一样的 [拼写错误] 由学识渊博的堆增阿旺 (ལྷ ཉ ཉ ཉ ཉ ཉ) 来消除，他为大乘佛教创制了如此精确的一个解释系统。该典籍精美印制的优点比如意宝珠还要大，它将消除像无数日月一样的一切错误，并让 [人们] 获得全面的理解能力。为了使所有的障碍都被消除，为了增强两种有利条件的积累，祈愿像太阳一样的佛法传向十方，像月亮一样的利乐照耀十方。祈愿所有已故的亲人们均能成佛，而那些仍然活着的亲人们能长寿。祈愿伟大的女施主能毫不费力地实现其所有的愿望。祈愿拥有

在目前我们所找到的有关玻东·确勒朗杰的两部传记中¹⁹，这一印刷项目被记载为15世纪上半叶一系列印刷出版物的一部分²⁰，但是相关记载只是将该著作的印制笼统地归因于苏措的人，即苏措的统治者们。

根据玻东巴 (བོད་དཔ) 大师尊巴曲勒 (དྲଙ୍ଗ རྩྣ བྱକ୍ଷଣ གླେଣ୍ଜୁ 1437–1521 年) 的传记记载，

ଶ୍ରୀମଦ୍-ବେଦା-ଶତିତ୍-ଶ୍ରାନ୍ତ-ଏ-ବ୍ସତ-ପ୍ରଣା-ଶୁଣ୍ୟା ଦ୍ୱୟା-ଶ୍ରୀ-ପିଣା-କାର-କାର-ଅଧି-ଦ୍ୱି-କ୍ଷେତ୍ର-ଦ୍ୱା-|| କୋ-ପ୍ରା-ଦ୍ୱା-ମା-ମା-ମା-କୁଳ-ପ୍ରା-ଦ୍ୱା-|| ମା-ମା-ମା-ମା-ମା-ମା-ମା-||

20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一个被称为邦顿·索南坚赞（ಫಂಡ್ರುಂದುನ್‌ಸೋನ್‌ಕಾಂಪಣ್ಣ）（即前文提到的仲钦·索南坚赞）的苏措官员，被北部拉堆地区的统治者所杀害，上述题记还提到死亡的其他官员，表明他并不是那次事件中唯一丧生的官员。很可能他是南部拉堆和北部拉堆间无数次冲突，或邻近政体间发生边界冲突中的一个受害者。无论导致这些官员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印制书籍是当地为逝者积累福德的一种悠久传统。该题记的风格与 1407 年协噶版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和 1443 年在羊卓（ಯಂಡುಂಗ）印制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等版本题记风格相似，1443 年版本题记中还包括对圣地和统治家族的赞颂²¹。在题记中着重提及直接参与该著作印制的苏措女统治者，可能是一种从政治需要抚慰人心的一种方式，即通过依靠佛法来应对苦难和动荡的时局。根据上述著作题记，苏措女统治者出生于统治家族（而不是嫁入统治家族），是一位获得成就的宗教大师，而且显然是独身的。我们也可以推断在苏措地区她可能起到了一个摄政的作用，否则在题记中会提到苏措的统治者本人。从这点上看，我们可以说她与贡塘王国王后拉仁钦措有一些共同特点。拉仁钦措是制作手稿，达姆南卡桑姆是印制著作，她们都以佛教方式支撑统治愿景。在必要时，这些都可以由一位妇女来进行。佛经印刷也提高了苏措地区僧俗工匠的雕刻技艺，使他们在整个地区都负有盛名，后来他们还参与了米拉日巴（ಮಿಲಾರ್ಬಿಧ）传记，及其道歌初版等著名印刷项目的印版雕刻工作²²。著名的噶举派喇嘛堆增阿旺（ಗುಣ್ಣೆ-ಗುರು-ಡಾಂಗ್）也参与编辑《显密典籍精要荟萃》的印制、出版工作，显示那时各教派及传统边界是极其不稳定的²³。这也表明他们请一位备受尊崇且非常能干的宗教大师，做编辑和校对的棘手工作，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的。

苏措的女统治者是玻东·确勒朗杰的一位忠实信徒之外，其它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我们对玻东·确勒朗杰的另一位忠诚的女弟子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她就是贡塘王国的公主曲吉准玛，她同样获得了女规范师的名号。

21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22 Porong Dawa, "New Discoveries in Early Tibetan Printing History."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195-211.

23 作为拉奇瓦·南卡坚赞（拉萨·南卡·晋美·南巴·旺扎 1372-1437 年）的弟子，堆增阿格汪布（堆增·阿格·旺布·尼玛·多吉）是热琼口传传统（热琼·萨噶尊）的继承者。参见 Michael Pahlke, *Die Hagiographie des La phyiba Nam mkha' rgyal mtshan*, Wiesbaden: Ludwig Reichert Verla, 2012: 249. 在曲吉准玛传记第 59 页正面，他也作为一位备受尊重的宗教上师出现了。尽管对他只是一提而过，而提及他这件事本身也证实了在 15 世纪 40 年代他是该地区一位重要的宗教权威。

曲吉准玛：公主、尼姑和转世活佛

曲吉准玛生于 1422 年，是贡塘国王赤拉旺坚赞（ୱିଜୁ ଦ୍ୱାରା କୁମାରଙ୍କଣ୍ଠ 1404–1464 年）的长女。嫁入南部拉堆的统治家族后，她毅然放弃世俗生活，成为一名尼姑。依靠其王室亲人的支持及其作为筹款人的卓越能力，曲吉准玛成为了印刷艺术最伟大的赞助者。她编辑了其上师玻东·确勒朗杰的诸多教义，并当印刷工艺在卫藏地区还处于初期阶段时，资助印制和出版了这些教义。曲吉准玛也特别致力于对宗教女性的教育。在她的传记中，描述了她在各地都有追随者，而且在她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尼姑。她也建立了给尼姑们教授佛教教义的一个很好的系统，以便“尼姑们能够形成好的阅读技巧。”²⁴ 她与著名的瑜伽师汤东杰布（ସନ୍ତ ଶ୍ଵର୍ଗକୁଳାଙ୍କ 1385–1509 年）一道，支持修建了横跨雅鲁藏布江的铁索桥，以及诸如迥日乌齐（ଗୁରୁ ରିଂକେ）佛塔这样的建筑杰作。后来被认定为密宗神祇多吉帕姆的化身，她也是藏传佛教中为数不多的受具足戒的女性之一。临终前与一群亲炙弟子一道前往工布的著名神山杂日（ଚାରି），并在这里圆寂，时年 33 岁。不久，如下所述，她转世为贡噶桑姆。

她的传记（《曲吉准玛传记》62-63页）为我们了解撰写、编辑和印制出版其上师教义的过程，提供了珍贵的简短叙述，使我们能够对整个过程窥见一斑。显然这是夏季宗教修习中讲述教义活动的一部分，当时有大量的人参加：

然后她给其弟弟 [即赤朗杰德 (གི་朗杰德)] 建议说, 应该邀请吉遮 (གི་遮) [确勒朗杰] 及其寺院团体 [到这里] 进行夏安居修习 (དྱତ୍ୱରାଣନ୍ଧାନ)。其弟弟资助了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 更顿协尔巴 (དྲ୍ଗୋ རୁବ མେତ୍ରା) 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费用²⁵, 而伟大的女圣者 [指曲吉准玛] 提供了 [剩下的] 三分之一的费用。[确勒朗杰] 被邀请到班乃乌则寺 (དྲ୍ଗୋ རୁବ དୱାଜେ བାନେ) 居住, 在该寺萨迦班智达曾与一位外道辩经, 并赢得了此次辩论²⁶。……[这些人] 也学习和演练了大手印

25 这可能是来自协尔的一位头人或一个代表，而协尔是吉隆镇西南部的一个重要地方。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似乎非常有可能。或者，如果“协尔”是“夏尔”误写的话，那么这可能是吉隆北部的叫格顿夏尔（કાગદુંધર）的寺院的一个代表。参见 K. H. Everding, *Das Koenigreich Mangyul Gung thang*, 2006: 641.

26 这是指萨迦班智达和措杰嘎瓦（**හැරිනාද** Harinada）之间著名的辩论。就后者的详情，参见 Pascale Hugon, "Clapping hands in sKyid grong? Logical and contextual aspects of a famous debate narrative."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012 (23) : 51–102.

传统的“与生俱来”(ശ്വസനാശ്വസി, 又译作萨哈加)瑜伽以及《隐意释难》(ശ്വസനാശ്വസി)系列的教义。[曲吉准玛]亲自指导参加法会的信徒们的所有活动，并[下令]检查为参加法会的信徒所讲授的教义的内容，也[下令]将这些教义写出来，并[下令]编辑这些教材，以便将它们印刷出版。她还下令印制了法王本尊像，并让人看管每一件仪式法器。为了让喇嘛高兴，她负责所有上述活动，并为聚集在遍知一切的[上师]周围的人们要进行的庆祝活动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还为[庆祝活动]提供各种诸如青稞酒、白酒和蜂蜜等食物和饮品。[此外]，她还[组织]为神子即国王[赤拉旺坚赞]和王室的叔侄们提供服务。她看起来从不知疲倦，而且不间断地且十分高兴地做一切事情。那时，在厨房工作的随从们[显然是尼姑们]告诉[曲吉准玛]：“我们不仅不得不完成我们的任务，而且还不得不侍奉其他人，[侍奉这些人]到这个地步比做世俗的工作还要糟糕！”²⁷

此次撰写、编辑和印制出版的《隐意释难》，被认为是《确勒朗杰传》中提到的于1453年由阿里的寺院赞助出版的为同一本著述²⁸。很可能《隐意释难》的印制出版，是曲吉准玛传记中记载的宗教集会的成果，该集会是在15世纪40年代一个夏末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是玻东巴印刷出版非常活跃的时期。

这次集会不同寻常，不仅参加的人员众多，而且很多人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其中包括与其父王有矛盾的弟弟赤朗杰德，以及桀骜不驯的协尔（阿扎）地方属民。他们与曲吉准玛一道成为该印刷项目的赞助者。她也邀请了其父王以及大量贡塘王国王室亲属。其传记也明确指出曲吉准玛主动向其弟弟建议参与该项目。该项活动无可否认具有曲吉准玛的宗教目的外，也是其宗教外交活动的一部分，她试图通过这些活动来缓和王国政局领导层的重重矛盾。虽然她为此做了种种努力，但不久其王国的局势就失去了控制。因此，为了安抚逃往协尔地方的弟弟，她不得不直接进行干涉。在其坚持下，才通过协商达成父王和弟弟的妥协。不久，其弟弟就登基了，与其父亲一道成为贡塘王国的统治者。后来弟弟也成为印刷事业最伟大的王室赞助者之一，在赞助印刷其他

²⁷ 就该传记的翻译，参见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149-238. 然而，在该译本中译者省略了编辑是为了对雕刻的印版进行校对（শৰ্কুন্দৰ）这一重要细节，只是简单地将此译为“编辑”。

²⁹ 典籍的同时，也资助印刷了米拉日巴传记及米拉日巴道歌。

参加此项活动的人群不仅仅是僧尼，似乎也有更多其他不同程度了解经典内容的俗人参加。根据确吉准玛传记记载，她是从其母亲那里学习了读写，这似乎表明包括妇女在内的精英成员至少有一部分是识文断字的。参加此类聚会的人可能比高层要员更加广泛，印制佛像和典籍的仪式效果会保证将加持惠及每一个参与者，包括那些不识字的人。曲吉准玛认为宗教教育会带来和平，典籍的复制是她试图实现这一远见卓识的方式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既印制了典籍，也制作了手抄本，她深信不疑佛教经典的仪式力量。

曲吉准玛的传记还记载，玻东·确勒朗杰圆寂后，她决定重新印制该上师的文集，在印制所用的墨水中掺入大师的鼻血。这可能是对一次真实仪式行为的描述，也可能是常见的文学书写手法。由于玻东·确勒朗杰生前似乎经常流鼻血，因此，他们有足够的鼻血可以使用。考虑到该文集的规模如此宏大，曲吉准玛这一次似乎更喜欢制作手抄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编辑作坊，在保证文集质量的前提下完成了制作任务。她制作了两套该上师的文集，一套送给贡塘王国，另一套送给贝姆曲丁寺（དཔེ་མཆེན་ཆོ功德寺），该寺是玻东·确勒朗杰大师的主要寺院。这是曲吉准玛纪念其上师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之一。曲吉准玛在处理上师遗物时，为避免发生各种矛盾，她将上师遗骨骨片分给了寺院大众，用上师骨灰混合泥土制作的擦擦（小型佛像）分给了上师的世俗追随者。

曲吉准玛通过在贝姆曲丁寺附近建立水渠，以此来体现她的佛教作为和平原动力的思想，她认为通过生产足够多的食物来支撑一个大的宗教修习中心，那么就会给贡塘、南部拉堆和北部拉堆的邻近政权带来和平。以她的观点来看，将带来如下益处：

[这]将不仅对住在贝塘(ቤတ်)平原的人们大有益处，也将成为来自“堆”(ቤ်)各地区、印度、尼泊尔等地在藏地旅行的人们最好的庇护地，这些人在旅途中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忍受的焦虑。特别是，可以在这里建立一座大寺院，南部拉堆、北部拉堆以及阿里³⁰的学者可以聚集在这里，学习和修习宝贵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通过宣传该文集，该法王致力于佛法发展的努力将得到广泛传播。再者，由于这些善行，这一伟大的地方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29 参见《藏文大藏经》第十一册，第175—176页。

30 在这里下部阿里指的是芒域贡塘。

³¹ 和平。

她明确指出这一愿景是古代印度佛教的重现，但其乌托邦式的愿景没有能够成功地实现。由于传记的叙事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的，这些叙事反映了真实的生活情景，当然也有常用的文学譬喻手法。因此，这一传记为我们了解曲吉准玛推动印刷事业，以及大量其它活动场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我们对其他直接追随她的妇女们的情况却知之甚少。

作为一位女活佛的衮噶桑姆

曲吉准玛心怀雄心壮志和一些伟大的计划，与一群男、女弟子一道前往工布的杂日神山。但她抵达圣地后不久就圆寂了。正如本文的作者之一在其他论著中所探讨的那样，这使得围绕她而形成的团体处于困境之中³²。没有授权，也没有正式移交权力，其弟子们无法调动其关系网络去继续实现她的遗志。在这种紧迫情况下，她以一个新的化身出现了。衮噶桑姆（ぐんが・サンム 1458–1549 年）被确认为已过世公主的化身，被严格培养成高僧，与曲吉准玛公主一样，她被认定为多吉帕姆活佛世系的转世之一³³。

衮噶桑姆最终成为一个活佛转世系统的一部分，活佛转世是由宗教界活佛转世仪轨原则来实现的。尽管她拥有女性活佛的显著地位，但遗憾的是有关她的信息非常少。我们只掌握了有关她的如下信息：《坡东教法史》和居美德钦（ଘୁର୍-କେନ୍-ସଦ୍-କ୍ଷେତ୍ର）所著的《汤东杰布传》中有其简短的生平记述，她偶尔出现在诸如藏弄·黑如噶（ଶାନ୍-ହୃକ୍-ତେଣା）在内的其他大师的传记中，以及现存于布达拉宫的《教义精要》手抄本中提及她的一些叙述。

衮噶桑姆与贝其美珠巴（དྲ བ ཀ ར ཉ བ ང ན ག ད ལ ཉ བ ང 1420—1478 年）一道到西藏各地旅行，后者是曲吉准玛随从中与她关系最密切的男性成员之一。她得到了羊卓地区统治者们的热情款待和支持，他们是玻东·确勒朗杰忠诚的弟子，而且都曾参与玻东巴各项印刷项目。³⁴

³² Higd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246-249.

³³ Higd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246-249.

ମୁଦ୍ରଣ ତାରିଖ 1993 (1.1): 20-43.

³⁴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贝其美珠巴 59 岁圆寂时，衮噶桑姆做了其前世曲吉准玛为其上师所做的一切活动。1478 年，她成立了一个工作坊，在三个月内，她编辑了玻东·确勒朗杰的整个文集，即《教义精要》，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制作出版了该文集。该文集的目录页现存于布达拉宫中，其中提及了制作的时间和地点，也谈到了她在该文集的编辑和制作中所起的中心作用³⁵。

衮噶桑姆那时还比较年轻，她继续支持大量的佛教善行，其中包括维修桑丁寺（សាស្ត្រវិនិច្ឆ័យបុរី）、建立佛教学院等活动³⁶。在一本重要的手抄本制作的题记中，她被赞颂，但目前我们不是很确定她是否直接参与了此印刷项目。毫无疑问在羊卓她是致力于学术活动和书籍制作的，成为这群人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印刷技术³⁷。她也见到了《米拉日巴传记》的著名作者藏弄·黑如噶³⁸。

衮噶桑姆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地位：从她很小的时候起，其宗教身份便定型了她一生的生活。被认定为曲吉准玛的转世后，衮噶桑姆接管了曲吉准玛的关系网络。她从来不需要为放弃世俗生活而争斗，她很好地适应了这个关系网络为她定义好的角色。与曲吉准玛一样，就佛教善行而言，衮噶桑姆既是赞助者，也是被赞助者。而她所能动员的资源，主要取决于这个组织架构本身。另外，我们从衮噶桑姆父母的名字中得知其家庭出身，但是并不知道其社会地位。

衮噶桑姆和苏措的女统治者南卡贝桑姆相比时，后者有较强的政治形象，其宗教身份支持她成为统治家族一个成员。她们两人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宗教经历，但都为玻东巴传统的巩固和传播做出了贡献，她们都属于连接拉堆及贡塘地区、羊卓地区一个广泛的关系网络。

德勒曲珍：一个忠实的助手和关键人物

曲吉准玛传记中反复提到德勒曲珍（དྲ གྱଣ ཀྱଶ ཁྱଶ ཁྱଶ 15世纪），她一定与曲吉准玛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可能在建立曲吉准玛传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位妇女。15世纪40

³⁶ Higd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276-277.

³⁷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年代，德勒曲珍加入到曲吉准玛随从的队伍中，成为一名年轻的宗教同伴和尼姑助手，只有在她被委以特别的任务时，才会与曲吉准玛分开。尽管在《曲吉准玛传记》中，并不显著地突出她，但她可能充分地参与了曲吉准玛所有善行的活动中，包括书籍的制作。

德勒曲珍追随曲吉准玛到了杂日神山，而且在后者圆寂后，在认定衮噶桑姆为转世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将衮噶桑姆抚育成人中也可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³⁹。通过分析《曲吉准玛传记》的叙事，我们可以推测出尽管她不是该传记的作者，但她很可能在该传记的编写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不是很清楚德勒曲珍的社会地位，在普通妇女的叙事中并没有她的讯息，这些一般妇女是各种事件叙事中很少提及的，但在曲吉准玛和汤东杰布的传记中都提到了德勒曲珍，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诸如索南珍玛（សោន្តរាជនាមីនាគ）⁴⁰ 以及后来的乌坚曲吉（ុំត្រូវកេសាស្ត្រិប）⁴¹ 这样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崛起成为宗教大师，才得以成为专门叙事中的主角。

降曲桑姆：该地区一位主要尼姑

曲吉准玛前往杂日神山时，她属下的一些尼姑留在了她们的家乡。其中一位留下的尼姑便是降曲桑姆（ୟତ୍ନାମହିମାଙ୍କୁ 15/16 世纪）。在《曲吉准玛传记》中，她首次以贝姆曲丁附近曲吉准玛尼姑院中一位地位较高的管事尼姑（ଦ୍ୱାରାମହିମାଙ୍କୁ）的身份出现，而且她是与曲吉准玛一道在宗噶（ଜୁଗାଙ୍କ）附近建立静修处的一个尼姑小团体的一部分⁴²。在描述那些协助办理有关制作、出版玻东·确勒朗杰文集，以及在宗噶进行相关庆祝活动后勤工作的众尼姑中，再一次提及了她：“就必要的协助工作而言，诸如传递信息、研磨炒熟了青稞[来制作糌粑]以及制作青稞酒等工作都由首席尼姑降曲桑姆主管。”⁴³

曲吉准玛离开后，降曲桑姆成为玻东派关系网络中备受尊敬的尼姑。她请求玻东派

³⁹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246-247, 249, 299.

⁴⁰ Suzanne Bessenger, "Sonam Pelden", <http://treasuryoflives.org/biographies/view/bsod-nam-dpal-%27dren/13196>, 2013.

41 Kurtis R. Schaeffer, *Himalayan Hermitess: the Life of a Tibetan Buddhist Nu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29.

42 ପିତ୍ରେଣ୍ୟାଗଦ୍ୟଶ୍ଚ ସନ୍ତୁଷ୍ଟ କରନ୍ତା ମୁଦ୍ରିତ ଶିଳ୍ପୀଙ୍କର ସାମାଜିକ ଏକାତ୍ମକ ପରିପ୍ରକାଶ ମଧ୍ୟ ପରିଦର୍ଶନ କରିବାକୁ ପରିଚାରିତ କରିଛନ୍ତି ।

43 ພຣີນາ·ອາສດ·ວິຫຼຸ້ນ·ພັນດ·ກະລາງ·ມຸນືຖື່ງ·ສີ່ຈຳ·ແກ້ໄຂ·ສະຫຼຸງ·ສັກ·ມັດ·ມັດກະລາງ·ອົງກະຕູ່ງ·ວິດີ·ກົງກະລາງ 96a

大师尊巴曲勒撰写他本人的传记⁴⁴,该传记在大师圆寂后被印制。降曲桑姆以各种方式为尊巴曲勒大师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她在果荣巴策碧(රྒྱର୍ମ བାତ୍ୟି)照看大师⁴⁵,对那个时代伟大宗教大师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未被传记具体记录。她与下文提到的年轻衮都桑姆,在1485年寻找一位宗教上师时,咨询的至尊尼姑降曲桑姆可能是同一人⁴⁶。

虽然过去我们对降曲桑姆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最近发现的衮都桑姆传记，使我们对她加深了一些了解。加之，我们从其上师和密宗伴侣藏弄·黑如噶的传记中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的信息就多一些了，该传记是由桂仓热钦（**桂仓热钦** 1482—1559年）撰写的。

衮都桑姆：藏弄·黑如噶的明妃

15世纪90年代，玻绒贝姆曲丁寺（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迎来了另一位妇女——衮都桑姆（1464—1549年），她出生于西藏西南部且社会地位较高，该寺是曲吉准玛立誓成为尼姑、并与其上师玻东·确勒朗杰共同生活的地方。衮都桑姆与曲吉准玛一样，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其家族抗争，反对其家族的婚姻安排。她最终成为藏弄·黑如噶的明妃，后者编辑了佛教瑜伽师米拉日巴传记和道歌，并命人雕刻了传记和道歌的印版。

最近发现了她的传记，大约写于 1551 年，是由其主要弟子钦绕旺秋（ཆེན་རྒྱາ·དབྱངས་
旺秋）在自传性质的笔记以及其他弟子所写的简短传记的基础上撰写的⁴⁷。因此，我们对
她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

她出生于孜日（ଡେଣ୍ଣି）以西一个叫杰龙扎布尔（ଦ୍ୟାନ୍ତ୍ରମୁନ୍ଦରାଙ୍ଗାନ୍ତ୍ରମୁନ୍ଦର）的地方，据说离著名的朝圣地约一个驿站的距离。从扎巴坚赞（ଶ୍ରୀଶବ୍ରତସାହକର୍ଣ୍ଣ）的传记（51页）中，我们了解到杰龙（ଜେଲ୍ଲାଙ୍କାନ୍ତ୍ରମୁନ୍ଦର）位于协噶和宗噶，离纳东（ନାଥ୍ରୀଙ୍କାନ୍ତ୍ରମୁନ୍ଦର）不远，而纳东是藏弄·黑如

44 K. H. Everding, *Das Koenigreich Mangyul Gung thang*, 2006: 223.

46 ଅକ୍ଷ୍ୟ-ର୍ମା ନାଗ ଦେଖିଲୁ ଏହା ପ୍ରତିକାଳେ ଶାଶ୍ଵତ କେବଳ ଶାଶ୍ଵତ ନାଗ ଦେଖିଲୁ ଏହା ପ୍ରତିକାଳେ ଶାଶ୍ଵତ କେବଳ ଶାଶ୍ଵତ ନାଗ ଦେଖିଲୁ 1551: 9b.

47 ମାତ୍ରିକ୍ସମ୍ବନ୍ଧରେ ଶୁଣୁ ନୁହ ଏବୁନୁହ କୁଳା ଦ୍ୱାରା ପ୍ରାୟମାନ ଦ୍ୱାରା ଲାଗୁ ହେଲା ଏବଂ ପାଇଁ ପ୍ରମାଣ ଦ୍ୱାରା ପ୍ରମାଣିତ ହେଲା ଏବଂ ପାଇଁ ପରିଚ୍ୟାତ ହେଲା ଏବଂ ପାଇଁ ପରିଚ୍ୟାତ ହେଲା ।

噶经常居住的地方⁴⁸，也是制作米拉日巴传记和道歌首次印刷版本的地方⁴⁹。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时给她取名为衮布吉（ওঁ-বু-জি）。她是一位叫达纳囊巴（ଦା-ନା-ଙ୍କା-ବା）的统治聂拉木地方官员弟弟的女儿，该官员属于著名的萨迦“本勤”（ସାଜ୍ଚା-ବିନ୍ଦୁ-କ୍ଷେତ୍ର）萨迦桑布（ସାଜ୍ଚା-ସଂବୁ-ଦ୍ରୁଟ୍ର）家族。其母亲似乎居住在杰龙扎布尔，而衮都桑姆常常往返于聂拉木低地和孜日以西其母亲居住的高地之间。那时，聂拉木似乎是由定日刚噶（ଦିନ୍ଦୀ-ଙ୍ଗା-ନାମ）以西扎达统辖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正如吉仲（ଜି-ବୁଦ୍ଧି-ଶବ୍ଦ）是由宗噶统治，而卡达帕珠（କାତା-ପାତୁ-ଶବ୍ଦ）是由协噶统治的。这在衮都桑姆一个弟子印制的题记中有下述明确描述：“在繁荣昌盛的察达政权中，在伟大的聂拉木秘境。”⁵⁰因此，在该政权的高地与低地间有很紧密的联系，而该政权的辖地大致相当于目前的聂拉木县，它们之间紧密的联系是通过一系列通道而实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朗阔尔（ଲଙ୍କୋର）和通拉（ତଙ୍ଗୋର）山口的通道。

衮都桑姆小的时候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而且很早就显示出意欲追求宗教生活的征兆。1485年，她遇到了曲吉准玛随从之一的尼姑降曲桑姆，并向她咨询找一个真正的宗教上师最好的办法⁵¹。同时，其家族许诺将她许配给一位叫扎西卡（བ୍ྱା་ཤི་དྲୁ་མାର）的密宗大师，由于该大师家族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察达统治者（ཆ୍ୟାନ୍ଦା བ୍ྱାଣ୍ଧୁ）间的关系，这一联姻被认为是对衮都桑姆家族非常有利的。她虽反对此次联姻，但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不幸的是在完婚前，其未婚丈夫就逝世了。为此双方进行了密切磋商，最后她的姑姑嫁给了苏措统治家族的成员阿拉贝桑（ଆଳା ବେଶା ଦ୍ଵାରା），姑姑建议她以次妻的身份嫁到苏措。

她拒绝了家族为其所做的这一安排，继续追求实现其宗教生活的理想。为逃脱困境，有一个晚上，她从在古措附近纳东稍微靠北地方的扎西卡戏剧性地逃离⁵²。这在衮都桑姆

48 അതിനും പരമ്പരയാഗത്തിൽ നിന്ന് വിവരിച്ചിട്ടുള്ള ഒരു കണക്ക് ആണ് ഇത്. മാർക്കസ് സ്റ്റോൺ എന്ന വ്യക്തിയുടെ പ്രാഥമ്യ കാലത്ത് നിന്ന് വരുന്ന ഒരു കണക്ക് ആണ് ഇത്. മാർക്കസ് സ്റ്റോൺ എന്ന വ്യക്തിയുടെ പ്രാഥമ്യ കാലത്ത് നിന്ന് വരുന്ന ഒരു കണക്ക് ആണ് ഇത്.

⁴⁹ ཁ୍ରིན་ସ୍ଵାଧେନ୍ଦ୍ରଶ୍ରୀ འକ୍ଷଣମିତ୍ରାଚାର୍ଯ୍ୟ ଏବଂ ପ୍ରତିପଦ୍ମମଣିପୁରୀଙ୍କର ଗ୍ରହଣ କରିଛନ୍ତି ଏହାର ଅନ୍ତର୍ଭାବରେ ପ୍ରତିପଦ୍ମମଣିପୁରୀଙ୍କର ଗ୍ରହଣ କରିଛନ୍ତି ଏହାର ଅନ୍ତର୍ଭାବରେ ପ୍ରତିପଦ୍ମମଣିପୁରୀଙ୍କର ଗ୍ରହଣ କରିଛନ୍ତି 1551:16a-19b; Porong Dawa, "New Discoveries in Early Tibetan Printing History."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195-211.

51 ଅନ୍ତର୍ମାଣକାରୀ ପରିପାଳନା କାର୍ଯ୍ୟକ୍ରମରେ ଏହାର ଅନ୍ତର୍ମାଣକାରୀ ପରିପାଳନା କାର୍ଯ୍ୟକ୍ରମରେ ଏହାର 1551: 9b.

52 由于在描述衮都桑姆夜晚逃离的那一段中提到了流经曼考布(མན་考·布)地区的曼楚河(ມණ་楚), 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扎西卡的方位, 曼楚河与从苏措流来的另外一条河流会合后, 形成了位于古措地区的崩楚河(崩·楚), 而古措地区就在纳东的北面, 再者, 在衮都桑姆传记 12 页正面描述了当她与上师索南桑布见面时, 她说道: “我们是古措一带的人(བྱང་措 བྱତ୍ସ སྐୱାଣ ན བླାନ୍ ཆବ୍ରିଚ).” 嫁到扎西卡家族后, 她反复地自称为扎西卡的女主人, 这表明上述衮都桑姆有归属感的两个地方, 即扎西卡和古措是部分重合的或至少是趋于一致的。

⁵³ 的传记中有栩栩如生的记载。

最终，她抵达了玻绒贝姆曲丁寺，但在那里请求皈依的事情并不太顺利。当她请求皈依三宝剃发为尼时，宗教上师降森仁钦贝（ඉං-සිංහ-රිච්-කේං-දෙප）拒绝了其请求，因为该寺在社会地位高的妇女要求出家方面遇到不少问题。经她再三坚持，才皈依三宝，并被赐法名贝旦吉（දෙප-ඇං-ඡැං）。她在贝姆曲丁寺静修，学习了玻东·确勒朗杰的教法。但她一再被催促回到扎西吉去。宗教上师降森仁钦贝建议她到南部拉堆合适的寺院去，认为这对其宗教修习和生活都有利。上师强调道：“如果你留在这里，就可能会受到阿拉哇（ଆ-ର୍ବା）[即苏措的统治者]领导人的惊扰和迫害，不仅你会有危险，而且我也会有危险。”⁵⁴感到此种压力，她决定离开玻东贝姆曲丁寺，到其它地方寻求其精神追求。她派助手衮琼巴（දේජ්-කුං-ඩා）去见已从杂日回来的“无与伦比伟大”的黑如噶，当时后者为了印制米拉日巴传记及其道歌，住在纳东协普（නො-ං-පු）⁵⁵。藏弄·黑如噶邀请她前来，准备向她传授佛法。

衮都桑姆的传记描述了在纳东进行的一系列宗教和社会活动，其中包括一次新年庆祝活动，她拒绝参加正式的庆祝活动聚会，穿得破烂的在另一个房间阅读米拉日巴传记及其道歌，这使人们感到难堪。那时坐在座位之首的是藏弄·黑如噶的亲炙弟子拉尊·仁钦朗杰（བླུ་བଣ୍ଡୁ རେ ཆେ དୋ གୁ ས୍ୱା 1473–1557 年）及其母亲，后者被描绘为明妃多吉帕姆（ྨ୍ୟା କୁଣ୍ଡିଳା ସମ୍ମାର୍ଥୀ）的化身⁵⁶。衮都桑姆作为贡塘王室地位尊贵的客人，他们邀请她参加正式的庆祝活动，她却拒绝参加。拉尊·仁钦朗杰他们一定是造访此地，或是到这里避

54 ଅତ୍ରିରୁଦ୍ଧାନ୍ତାଙ୍କ କୁଣ୍ଡଳାଶ୍ଵର ପ୍ରାଚୀନ ମହାକାଵ୍ୟାଳିକାରୀଙ୍କ ପରିମାଣରେ ଏହାରୁ ଅଧିକ ପରିମାଣରେ ଉପରେ ଥିଲା ।

56 就有关拉尊(喇嘛敦珠)的母亲为多吉帕姆(多吉阿妈)的化生的详情,参见 Michela Clemente, "The Life of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1473–1557) according to his rnam mgur and rnam thar." Dissertation, Rome: University of Rome, 2009: 3.3; Hildegard Diemberger&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s 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In *Nepalica Tibetica: Festgabe für Christoph Cüppers*, Band 1, Andias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13: 125.

难，逃离了贡塘王室内部导致拉尊·仁钦朗杰的父亲被暗杀的阴谋⁵⁷。衮都桑姆在纳东受到藏弄·黑如噶及其诸多弟子许多教义的亲传。最终他们完成印刷项目后，将印版运到了聂拉木卓普，这是位于聂拉木中部的一个有关米拉日巴的圣迹。衮都桑姆在该地区旅行，访问贡塘、洛乌（ຫວັງສູນ）和其它地区，而且常常回到聂拉木，并到拉其静修。过了一段时间后，得到了藏弄黑如噶圆寂的消息，这使她极度地难过。不久欧珠贝巴（ດຣມ່ວ່າ ສະຫຼຸມ-ດຣມ່ວ່າ-ອວລະບາ | 1456–1529 年）⁵⁸就撰写了藏弄·黑如噶的传记，该传记的印版于 1508 年在孜日桑林（ຂີ້ນ-ຊື້ນ-ສຳລັບ）雕刻，后来印版被运到卓普⁵⁹。同时也雕刻了藏弄·黑如噶的文集，并将印版也运到了卓普。

衮都桑姆在完成了为其上师所举行的葬礼仪式后不久，由于米拉日巴道歌的第一版有一些缺陷，她决定重新印刷它：

那时，无敌之母[指袞都桑姆]想到：当上师还活着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米拉日巴道歌的木刻印版的字形普遍比较小；因此，并没有完全实现他脑海中有有关印版的设想。通常，为了利益佛法和众生，并不违背上师的想法，她决定恢复印刷活动。她派了弟子们带着其书信到古格、普兰以及其它地方去征集捐款⁶⁰。在曲瓦尔(કྲଵାର)地区扎西岗(ଡ଼୩. ଶେଷାଶ୍ଵର)的协普曲辛岗(ମେଣ୍ଟୁଣ୍ଡକୁନ୍ଦିଙ୍ଗ)停留一段时间，做准备工作后，他们前往聂拉木的卓普。他们到杂日各地的弟子和施主那里征集到部分印制经文所需的捐款。然后住在[拉其的]色普(ଶେଷୁଣ)地方，并征集了刻印印版等印刷所需的捐款。从四面八方征集来的

57 就这一段的详情, Michela Clemente, "Shedding Some Light upon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1473–1557): A Study of Two Untranslated Works from the Tucci Tibetan Collection." In *From Mediterranean to Himalaya. A Festschrift to Commemorate the 120th Birthday of the Italian Tibetologist Giuseppe Tucci*, Edited by Francesco Sferra and Dramdul, Beijing: The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2014: 457–63; Hildegard Diemberger&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s 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2013: 122–125.

58 欧珠边巴是藏弄·黑如噶亲炙弟子之一，也是后者第一部传记的作者。

Stefan Larsson, "Prints about the Printer: Four Early Prints in Honor of the Mad Yogi of gTsang." In Hildegard Diemberger, Franz-Karl Ehrhard, Peter Kornicki eds.,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309-331. Marta Sernesi, "A Continuous Stream of Merit: The Early Reprints of Gtsang smyon Heruka's Hagiographical Works."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011(40): 170-237.

大量捐款都在短时间内送达。曾多次召集从曼噶布(මංගාඩ)和苏措(සුංචේ මත සැක්සෙන් පිටපත් නිවාසයෙහි)来的抄经者以及雕工。其弟子洛班(ලොඛජ මත සැක්සෙන් පිටපත් නිවාසයෙහි)担任编辑，并新雕刻了108块印版。⁶¹

传记的叙事还提到她们完成在剩余印版上做完标记后，衮都桑姆让工匠们进行庆祝活动，并给他们付了工钱。雕刻印版的工序一完成，他们就根据胜乐金刚沙坛城，对所有的印版进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和火供仪式。那时，彩虹出现在蓝天上，而且香气四溢，弥漫整个地方。该传记还提到当他们完成对米拉日巴道歌集中插图的最后润色时，每一位在场的人都看见诸多智慧神出现在影像上，使他们都心生虔诚的信仰，这也是一个神奇的迹象。他们将印版迎请到卓普，并将印制的米拉日巴道歌集分发给各地的诸多施主和弟子⁶²。

在重新刻印米拉日巴道歌以及米拉日巴传的印版时⁶³，衮都桑姆选择了一个新的策略：并不像其上师所做的那样，将木头送到诸施主和工匠所在的地方刻印。这次她邀请他们到拉其地方拥有茂密森林的米拉日巴圣迹色普去刻印，这里有大量的桦树，而桦树是最常见的用来制作印版的木材。这一次雕版刻印花的时间要少得多，仅仅几个月而已，但可能包括夏季的雨天和冬季的下雪天。她主要依靠较为广泛的施主关系网络，以及以往参与过她组织刻印项目有经验的工匠小组。她尽力说服他们到这个偏远的圣地，并通过组织一次大的庆祝活动，在刻印工程完成前就给他们发放工钱，这样使他们心情愉快地投入刻印。

印版风格要进行一些革新，只有找到原来的印版，才能找出原来印版上字体大小不一的问题，新刻印版对此进行了纠正。抄经者和雕工都是来自曼噶布和苏措⁶⁴。他们中的

63 在提到纳东版时，传记和道歌（કાવ્યાશ્રય）是一起被提及的。而在色普版中，只提到了道歌，但可能是指道歌和传记的。

⁶⁴ Porong Dawa, "New Discoveries in Early Tibetan Printing History."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195-211.

许多人都曾参与了衮都桑姆 1508 年的孜日桑丹林项目⁶⁵。因此，刻印比较顺利。与纳东和孜日版本一样，她将上述这些印版从色普运送到了聂拉木中部地区的卓普印经院。

卓普印经院位于米拉日巴圣地，离衮都桑姆娘家的祖屋比较近。显然对藏弄·黑如噶及其诸弟子而言，该印经院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后来衮都桑姆修复了卓普印经院⁶⁶，她让其一些亲炙女弟子住在该印经院或附近地区。

衮都桑姆在拉堆地区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其间她访问了包括秘境堪巴龙（መንግሥት ቀበሌ የቤተሰቦች）在内的许多地方⁶⁷。然后，她决定前往西藏东南部的杂日神山⁶⁸。

衮都桑姆到杂日所走的路线与曲吉准玛所走的一样。但与曲吉准玛不同，衮都桑姆在杂日生活了很长时间。成为了达布（ດະບັບ）和工布（ກົບ）地区的宗教领袖，并于1549年89岁逝世前，被认定为多吉帕姆的化身⁶⁹。

袞都桑姆的传记，列举了其男、女弟子及其建立的或支持的寺院的长名单。作为藏弄·黑如噶的宗教继承者，袞都桑姆拥有遍及整个西藏的关系网络，其中包括一些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上师。其中最著名的是桂仓热钦（ཆོས་ཅན་རྩ་ཆེན། 1482–1559 年），她将后者任命为热穷普（རྩ་ཆོན་ප්‍රාග්）的寺主。她在使藏弄·黑如噶及其诸弟子所著的一些典籍，成为藏族文学经典著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⁷⁰。

衮都桑姆尽管像拉尊·仁钦朗杰的母亲一样，被认为是多吉帕姆的化身，但她似乎没有被认定为一个女活佛，因为从她那里没有产生一个活佛世系。其传统主要是通过上师—弟子关系以及亲属关系来传承的。

曲吉准玛和衮都桑姆属于同一个施主、宗教修习和亲属关系网络：当曲吉准玛的妹

65 Marta Sernesi, "A Continuous Stream of Merit: The Early Reprints of Gtsang smyon Heruka's Hagiographical Works."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011(40): 186-87.

⁶⁶ ଅଣ୍ଟିକା-ଦ୍ୱାରା ଲେଖିତ କୁଳ ପଣ୍ଡିତଙ୍କୁ ଏବଂ ମୁଖ୍ୟମ୍ ଏବଂ ଅନ୍ତିମ ପଣ୍ଡିତଙ୍କୁ ଏବଂ କୁଳ ପଣ୍ଡିତଙ୍କୁ ଏବଂ କୁଳ ପଣ୍ଡିତଙ୍କୁ 1551: 43a.

⁶⁸ ଅଭ୍ୟାସ-ରୁଦ୍ରମଣ୍ଡଳୀ କୁଶ-ପାତ୍ରଙ୍ଗମ-କୁରୁ-ଦ୍ୱାରା ପ୍ରକାଶିତ ଏହାର ପରିଚୟ ଓ ଅଧ୍ୟାତ୍ମିକ ଅନୁଷ୍ଠାନିକ ଅଧ୍ୟାତ୍ମିକ ପାଠକାରୀଙ୍କ ବିଭିନ୍ନ ପରିଚୟ ପାଇଁ ଏହାର ପରିଚୟ ଓ ଅଧ୍ୟାତ୍ମିକ ଅନୁଷ୍ଠାନିକ ଅଧ୍ୟାତ୍ମିକ ପାଠକାରୀଙ୍କ ବିଭିନ୍ନ ପରିଚୟ ପାଇଁ ୧୫୫୧: 47a.

⁷⁰ Franz-Karl Ehrhard,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Master's Writings: The Early Years of rGod tshang ras chen." In *Edition, éditions – l'écrit au Tibet, évolution et devenir*, edited by Anne Chayet, Christina Sherrer-Schaub, Robin, Françoise Robin, and Jean-Luc Achard, 2010:129-162 ; Stefan Larsson, "Prints about the Printer: Four Early Prints in Honor of the Mad Yogi of gTsang." 2016: 309-31.

妹赞林杰姆（*ਵਰਤੀ ਸਿੰਘ ਕੁਲਾਂ*）及其侄女堪卓杰姆（*ਅਨਦੀ ਬੜੀ ਕੁਲਾਂ*），到绒普（*ਚੰਡੀਗੜ੍ਹ*）的卫色普（*ਚੰਡੀਗੜ੍ਹ ਸਾਹਿਬ*）去聆听藏弄·黑如噶讲经说法时，袞都桑姆特别地创作了献给她们的歌曲，还将上述歌曲作为其上师道歌集的一部分印制出版了⁷¹。

杰出宗教大师的事迹，由于广泛的关系网络幸存下来成为叙事传统的一部分，而且该传统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兴盛。妇女是这些关系网络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些网络中亲属关系、赞助人与被赞助人间的关系，以及宗教归属等相互交叉，确保实现各种业绩，并保持诸传统，必要时能够产生变革。

旺姆央宗：袞都桑姆的侄女及其传统的继承人

旺秋坚赞（*ਵਾਂਕੁ ਜਿਤਾਂ* 1474–1552 年）所著《纳若巴传》的手抄本，是最近发现的一个文本⁷²，该文本让我们了解到袞都桑姆前往东部后，其家乡进行印刷活动的情况。此文本在卓普附近的聂拉木被重印。其印刷项目是由一位叫旺姆央宗（*ਵਾਂਮੁ ਚੱਗਦਾਂ ਜਿਤਾਂ* 16 世纪）的袞都桑姆的亲炙女弟子及其妹妹们管理的。作为袞都桑姆的侄女们，在其姑姑离开后，她们是其印经院的管理者。与袞都桑姆一样，她们与聂拉木的统治家族有关系，因此，她们能够调动各种资源进一步在当地发展袞都桑姆的事业。与她之前的许多宗教大师一样，旺姆央宗为实现一位已过世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庭未完成的愿望，开始印制在其著名姑姑要求下撰写的一部典籍。正如其他妇女的情况那样，我们对袞都桑姆侄女们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我们可以确定她们的姑姑是其伟大理想的源泉。袞都桑姆从一个叛逆者变成了一位道德模范，从而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权威，保护着那些继续其事业的人们。

撰写和印刷出版藏弄·黑如噶及其教派的重要著作中，察达统治家族在赞助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资助印刷米拉日巴传及其道歌集初版的赞助人，为了减轻察达统治者儿媳的丧夫之痛，藏弄·黑如噶专门为她创作了一首歌曲，袞都桑姆把这首歌在内的藏弄·黑如噶的道歌集进行了出版⁷³。

71 ਡੇਨਗ ਹੈਂਨਤ ਕਾਨਤ ਦਾ ਦੇਨਾ ਨਾਨਾ ਅਨੁਸਾਰ ਦ੍ਰਿਸ਼ ਦੇ ਕੇ ਦਫ਼ਨ ਥਿਆ ਸ਼ਕਲ ਤਦਾਂ ਅਭਿਆਸ ਦੇ ਯਤਾਂ ਵੱਡਾ। TBRC: W4CZ1248: 11b, 12a.

72 ਛੋਟੀ ਕਾਨਤ ਦਾ ਸਨੌਰੀ ਸਿੰਘ ਸਾਹਿਬ ਦੇ ਕਾਨਤ ਦਾ ਪ੍ਰਾਪਤੀ ਸਨੌਰੀ ਸਾਹਿਬ ਦੇ ਕਾਨਤ ਦਾ ਪ੍ਰਾਪਤੀ ਸਨੌਰੀ ਸਾਹਿਬ ਦੇ ਕਾਨਤ ਦਾ ਪ੍ਰਾਪਤੀ 2013.

73 ਡੇਨਗ ਹੈਂਨਤ ਕਾਨਤ ਦਾ ਦੇਨਾ ਨਾਨਾ ਅਨੁਸਾਰ ਦ੍ਰਿਸ਼ ਦੇ ਕੇ ਦਫ਼ਨ ਥਿਆ ਸ਼ਕਲ ਤਦਾਂ ਅਭਿਆਸ ਦੇ ਯਤਾਂ ਵੱਡਾ। TBRC: W4CZ1248: 11b, 12a.

贡塘诸女王及其他妇女

许多施主关系网络涵盖整个地区，特别是南部拉堆和贡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通过婚姻联盟、宗教联系以及贸易往来，使这种关系往往超越了各种政权的实际边界。由于木头、纸张、墨水以及着色剂常常是通过贸易获得的，跨喜马拉雅贸易通道确实在印刷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贡塘王统世系》提到曲吉准玛的父亲——赤拉旺坚赞是首位将印制典籍作为积德行善的行为之人，这可能与跨喜马拉雅地区关系网络的发展有关系。

曲吉准玛传记记载，赤拉旺坚赞娶了“崩卓（崩卓）姐妹中的一个”作为其次妻⁷⁴，曲吉准玛的母亲对此非常失望：她在四年前才嫁给国王，虽只生有两个女儿，但国王和她自己都很年轻，还可以力图再生一个男性继承人。赤拉旺坚参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也可能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决定娶紧邻贡塘以南被称为崩卓王国统治家族的一位妇女⁷⁵，该王国相当于目前尼泊尔拉苏瓦河谷的一个地区。这位次妻成了赤朗杰德的母亲，赤朗杰德是一位印刷的重要赞助者。但是在《贡塘王统世系》中，可能是由于缺乏证据，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抑或是将她当做门巴（门巴）/绒巴（绒巴）了，完全略去了对这位次妻家庭出身的描述，而且将曲吉准玛的母亲与赤朗杰德的母亲混淆了。

上部拉苏瓦地区曾经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目前也是以其纸张、颜料和木头而闻名。当地统治者们控制着跨喜马拉雅贸易通道，特别是吉隆通道。因此，很可能贡塘国王们的亲属网络在获得印制典籍所需的材料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后来，印版实际上是在诸如吉姆隆（吉姆隆）⁷⁶、哈兰姆布（约姆）⁷⁷和朗塘（朗昌）⁷⁸这样的秘境中刻印的。

我们在涉及印刷项目的相关题记中，发现在曲吉准玛之后提到了一系列妇女，尤其是贡塘王室的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只是长长施主名单中一些妇女的名字而已。

74 མི་ନେଣ୍ଣା ଆମ୍ବାଦିଶ୍ଚା ମର୍ତ୍ତାଦିଶ୍ଚା କର୍ମାଦିଶ୍ଚା ପରିଶ୍ରମାଦିଶ୍ଚା ୭୯。

75 崩卓既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它与崩卓噶勒有密切的关系，后者是上部拉苏瓦地区的一个统治氏族的名称。Ben Campbell, "The Heavy Loads of Tamang Identity." In Gellner, Pfaff-Czarnecka and Whelpton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a Hindu Kingdom*,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222-245.

76 Porong Dawa, "New Discoveries in Early Tibetan Printing History."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195-211.

77 Franz-Karl Ehrhard, "The Royal Print of the *Mani bka' bum*: Its Catalogue and Colophon." In *Nepalica-Tibetica: Festgabe für Christoph Cüppers*, Band 1, 2013: 143-171.

只有参照在不同的题记、传记和贡塘历史（即《贡塘王统世系》）中提到这些妇女的名字，有时才能窥见有关这些妇女故事之一斑。

我们推测在某些时候印制典籍是否会成为建立施主网络的催化剂，而这些网络以积累善行的共同佛教理想为名，弥合了政治冲突，巩固了已存在的关系。比如，在一些贡塘印制的典籍题记中，列有贡塘王室中对立派系中的成员。赤朗杰德（ཤིང་རྒྱ་ནྜོལ་
1426 ? –1502 年）⁷⁸ 以后，贡塘王朝分裂为源自该王两个妃子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分支，而且它们间常常有激烈的对抗，甚至有谋杀发生⁷⁹。那时，属于不同派系的王后们，似乎在赞助印制典籍中形成了合力：赤贡噶朗杰德（ཤིང་ཀླྷ རྒྱ་ནྜོལ་
? –1524 年）的王妃古格玛贡秋桑姆（གླྷ ສྒྱା གླྷ ཉ ཁྱ ཉ
），又称古格玛贡秋杰姆（གླྷ ສྒྱା གླྷ ཉ
）和桑珠德（བླྷ ສྒྱା ཉ
）的王妃喜绕杰姆（ཇୀ ສྒྱା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赞助了扬贡巴（ཡ ཉ ཉ ཉ ཉ
）道歌及其其它著作的印制⁸⁰。这个例子等都表明不应该把题记只理解为只是实际程序的反映而已，而应被理解为是实施宗教和政治计划强有力叙事，这些题记也反映出妇女常常在其中起到一个独特的作用⁸¹。贡塘印制的典籍不仅提到大量的妇女，而且在题记中也涉及大量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这表明参与印刷活动的人除了政治和宗教精英外，还包括更广泛的其他群体⁸²。从这点而言，妇女可能在扩大书面文字的接触面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过程的影响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评估，到目前为止很难从现存材料中获得相应的信息。

78 根据《贡塘王统世系》，赤朗杰德的生卒年月通常被认为是 1422–1502 年。然而，曲吉准玛的传记表明 1422 年是曲吉准玛的出生日期，而她的弟弟是约在 4 年后出生的。Hil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53, 121-122.

79 Hildegard Diemberger&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 s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2013: 119-142.

80 Hildegard Diemberger & 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 s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2013: 131, n.78.

81 至少一位妇女作为该印刷项目的工匠之一也被提及。就有关这一人物的详情，Michela Clemente, "On a Particular Aspect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ibetan Xylographs: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Importance of Crafts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o-Asiatic Studies* 2017(21): 373-395.

82 Michela Clemente, "The Patronage Network of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From Brag dkar rta so to the Phags pa lha khang." In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Special Issue.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uciano Petech, Rome 6–7 June 2014*, edited by Elena De Rossi Filibeck, Oscar Nalesini, Federica Venturi, Michela Clemente, La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2016:103-110.

作为宗教领袖和施主的妇女：服从、违背及革新

妇女在 15/16 世纪西藏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她们或是服从社会规范的立场来实施赞助，极少数可能是从违背社会规范的角度来实施赞助。上面提到的一些神圣女性被认定为女神多吉帕姆的化身，在这一关系网络中我们知道有三个这样的个案，即曲吉准玛，拉尊·仁钦朗杰的母亲以及衮都桑姆。在西藏，妇女成为活佛是很罕见的，但上述个案表明，妇女被认为是女神多吉帕姆化身比较常见。似乎通过被认定为多吉帕姆化身，这些妇女所代表的违背和超越传统的神圣力量，使其非传统的事迹及关系被大众认可⁸³。再者，婚姻似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曲吉准玛放弃了其婚姻，成为了几位上师的弟子，可能也是这几位上师的明妃，而且她的离婚引起了一场战争。拉尊·仁钦朗杰的母亲在做了贡塘王室一位成员（喜绕贝桑 ཕྱི་རྒྱ་དྭ་ན་）的情人后，成为藏弄·黑如噶的弟子⁸⁴。衮都桑姆多次拒绝接受对其婚姻的安排，最终成为藏弄·黑如噶的明妃及宗教继承者。据说她们三人都以不符合其亲属团体和地方人们期望的方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和私人关系。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历史资料，在何种程度上这类行为是否是精英妇女的特权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而这些精英妇女拥有为自己抗争的办法和操纵的空间。桑丁多吉帕姆（བསତ୍ତିଦ୍ୱାରା ପ୍ରକାଶିତ ସମ୍ମାନିତ ଦେଵତା），即曲吉准玛制度化的转世活佛，最终成为拒绝婚姻妇女的保护神⁸⁵，这一事实似乎表明这些问题比我们所了解的几个突出的例子要普遍得多。当然，这种女性的神圣性，可能为一些妇女和支持她们佛教团体中的男性成员，提供了形塑她们宗教生活的机会，以创造性的方式施行传统，并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但是，在一个将任何新的事物都视为是佛教教义的腐化，和对传承权威背离的环境中，只有在理念上以与过去的连续性的角度来架构，才会被人们接受；这样的诠释框架也被用于印刷活动。

西藏的印刷是与其他形式的书籍制作有连续性的。印刷不是取代手抄本的形式，而是对手抄本的一种补充，印刷保留了更多连续性的因素。雕版印刷的某些特征以及相关

83 关于她们所代表的女神金刚亥母，即多吉帕姆的特征，参见 Elizabeth English, *Vajrayogini: Her Visualizations, Rituals and Form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2: 1-607/8.

84 鉴于《贡塘王统世系》忽视拉尊·仁钦朗杰，他在较晚的时候才被包括在王统世系中，因此，她的关系非正式的特点是最合乎情理的解释。Hildegard Diemberger & 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 s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2013: 119-142.

85 K. Dhondup and Tashi Tsiring, "Samding Dorjee Phagmo: Tibet's only Female Reincarnation Line." *Tibetan Review* 1979 (August): 11-17.

的程序则富有创造性，它们使书面文字印制得更快，传播得更广，而且加强了编辑流程。印刷的传入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妇女的生活呢？妇女，至少是精英妇女并没有被排除在识文断字之外，但是识字的妇女人数很可能十分有限。目前我们很难找到相关信息来判断女性识字率是否因为印刷得到了加强。从自己母亲那里学会了阅读的曲吉准玛，致力于教授尼姑们阅读技巧，这表明至少对于宗教妇女而言，有更多的书籍可供阅读。这不仅涉及个人直接阅读，也包括给他人阅读书籍。当衮都桑姆一边在各地旅行，一边阅读《嘛呢全集》（*མ་നි· ພ ກ ຕ · ດ ນ ຖ*）时，她可能用的是自己的书，抑或更可能用的是相关家庭所拥有的版本，即华丽的手抄本或几年前曲吉准玛的弟弟赤朗杰德印制的版本⁸⁶。不久以后国王贡噶朗杰印制了一个发行更广的王家版本⁸⁷。因此，常见的典籍以印刷本的形式出现，增强了作为宗教活动仪式性的集体阅读。就衮都桑姆本人的阅读书籍而言，当她被当了尼姑的姑母带大时，学会了阅读，而且很可能是其姑母教会她如何为人们举行宗教仪式，这是很重要的积累善行和征集款项的活动。

妇女事迹只能从有关其他人的叙事中收集，而且在这些叙事中她们只是边缘人物，但是追随宗教大师的这些妇女成为了富有影响的宗教人物。曲吉准玛和衮都桑姆传记的发现，证明情况确是如此。

从中国西藏到欧洲：跨文化的审视

同时期欧洲妇女为抗争自己不想要的婚姻，充当修道院学员及女修道院的施主角色，并拥有宗教理想和对书籍的热爱等，这与同时代社会地位高的藏族妇女所过的生活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也通过其女性关系网络来影响当时的社会政治，常常是通过互赠图书来作为媒介的。她们让我们想起剑桥各学院的女赞助人，或资助手抄本的制作以及典籍印刷的贵族妇女。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充当贵族赞助者，她们往往通过守寡、拒绝婚姻或立下保持独身的誓言，使她们自己摆脱了家庭义务的束缚，而她们中一些人献身于女修道院的生活。这些妇女常常拥有共同的经历，并建立了与上述藏族精英的关系网络相似的网络，而这些网络常常与当时的宗教人物有关系，即主教与大主教，而这些宗教人物与这些妇女相互激励。比如，克莱尔·阿西西（1194–1253年）在拒绝结婚后，

86 ཚිජායෝග්-දෘජ-ඡේඛ-සා සුද-ඩං-කුල-රුනා ජ්‍යෙෂ්ඨ-උජ්ජාලා ඇ-ණ ජ්‍යෙෂ්ඨ-සුද-සුද-චිජ-දී-ඇජ-ජැජ-ජං | 1990: 15. K. H. Everding, *Das Koenigreich Mangyul Gung thang*, 2006: 139; Franz-Karl Ehrhard, *Early Buddhist Block Prints from Mang-yul Gung-thang*,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0: 14.

87 Franz-Karl Ehrhard, "The Royal Print of the *Mani bka' bum*: Its Catalogue and Colophon." 2013: 143-171.

于 13 世纪在意大利建立了贫穷修女会，她是丹尼修道院和剑桥大学的彭布洛克学院的赞助人玛丽·圣波尔（1303–1377 年）的精神源泉和道德楷模，在她的遗嘱中，请求让她穿着修女服下葬⁸⁸。与此同时，玛丽·圣波尔与伊丽莎白·德伯是朋友，后者为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赞助者以及艺术品收藏家，她们拥有相同经历与理想。弗兰西斯·昂德希尔⁸⁹将伊丽莎白·德伯视为是中世纪英国女性文化领袖，而文化领域只允许少数几个女性扮演公共角色的领域。在一个不关心妇女自我实现的世界里，这使妇女的自我赋权成为可能。伊丽莎白·德伯拥有的许多书籍都是附有插图的宗教典籍，而且有一条有关她给其女儿一本带有插图书籍的记录。她确保在其村子里贫穷男孩子能够学习唱歌、语法与逻辑。玛丽·圣波尔与伊丽莎白·德伯都经历过英国内战时期，她们的亲人们都参加了内战，在内战期间女性关系网络在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在克莱尔学院伊丽莎白·德伯塑像的序言中，她特别地提到“学者应该和睦生活。”

对书籍的热爱形塑了这些妇女中许多人的生活，而且她们中有些人参与到印刷活动中。比如，约克的玛格丽特（1416–1503 年）资助了英国第一本书籍的翻译和印刷出版，即由威廉·卡克斯顿翻译和印刷出版的《特洛伊历史故事集》⁹⁰。1749 年，詹姆斯·爱墨斯抄写的卡克斯顿的序言，赞颂了约克玛格丽特的美德，以及她对实施该项目的重要性，其中还提到她修改他的英文。这可与藏文题记中有关施主的欢欣鼓舞的描述媲美⁹¹。

在整个欧洲，我们都发现有些妇女曾赞助印刷出版活动，使更多的人们更容易获得以本地语言书写的书籍。比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1475–1539 年）是几类艺术活动的重要赞助者，并资助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坚持书籍质量需要上乘，且价格需要合理⁹²。当其丈夫不在场和其儿子还年幼时，她还担任了曼图亚的摄政，扮演了很重要的外交角色。有时她被称为“穿裙子的马基雅弗利”，以其外交手段而闻名。正如一些与她同时代的藏族妇女那样，她通过与法国这个邻近的政体协商，而避免了与后者发生一场战争⁹³。

也有证据显示，中世纪欧洲妇女成为书籍的重要购买者。比如，伊莎贝拉·德埃斯

88 Jennifer Ward, *Women in Medieval Europe 1200–1500*, London: Longman, 2002: 1-300; Sean L. Field, "Marie of Saint-Pol and Her Book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010 (513): 384-387.

89 Frances A. Underhill, "Elizabeth de Burgh: Connoisseur and Patron." In June Hall McCash ed., *The Cultural Patronage of Medieval Women*, Athens Ga,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90 Russel Rutter, "William Caxton and Literary Patronage." *Studies in Philology* 1987 (84.4): 440-470.

91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being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printing in England." printed by W. Faden and quoted in June Hall McCash ed., *The Cultural Patronage of Medieval Women*, 1996: 33.

92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being an Account of Printing in England." printed by W. Faden and quoted in June Hall McCash ed., *The Cultural Patronage of Medieval Women*, 1996: 33.

93 George R. Marek, *The Bed and the Throne: The Life of Isabella d'Est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1-263.

特拥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妇女所拥有的图书和妇女使用图书的情况。在欧洲图书史上，似乎妇女不仅扮演赞助者的角色，也扮演读者的角色。她们特别喜欢地方文学，并积极地推动其发展。妇女也被承认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翻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⁹⁴。这些妇女的女儿们通常不像男孩子那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她们在其女儿们的教育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相平行，藏族妇女很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在普及各种典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资助书籍的制作、书籍的阅读、让人阅读书籍、教授孩子们和其他妇女阅读和写作。还有一些个案是妇女成为了颇有造诣的、被她们自己的社会团体中的男性和女性公认为宗教上师。我们认为在一个妇女没有多少财产以及合法权利的社会中，参与书籍的制作、阅读以及教授阅读技巧等，使得这些妇女找到了她们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

结论

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有情众生，像藏族男性一样，藏族妇女一直在为获得解脱而奋斗，这反映了被阿兰·斯邦伯格称作“救赎包容性”的现象。然而，正如已经很好被证实的那样，相关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常常将藏族妇女置于服从和被限制的地位中，通常是通过佛教性别歧视的诸多叙事来进行的。我们探讨了数十位参与佛经印制等佛教善行藏族妇女的生活，可以从她们的经历中确认一些共同特征：由于精英的社会地位，为这些妇女提供了能够让她们实现宗教理想的手段和操纵空间，大多数我们知道的女性赞助者和女性宗教领袖往往属于精英阶层。而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常常很可能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崛起成为宗教地位突出者。正如在不少资料中表明的那样，尼姑们参与诸多佛教事务，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很可能没有被记录所参与各种佛教善行。就是上面提到的苏措女统治者和曲吉准玛等一些例子，甚至地位更加显耀的一些妇女，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⁹⁵。

为了佛教救赎人的目标，藏族精英妇女参与赞助印刷出版活动。她们似乎有独特的方式参与此类活动，而这些方式与她们在婚姻联盟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在一个政治上分裂且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她们不得不通过其亲属关系充当使者。她们似乎处于一个特别

94 Anne Lawrence-Mathers, "Introduction," In Anne Lawrence-Mathers and Phillipa Hardman eds., *Women and Writing, c. 1340–c. 1650: the Domestication of Print Culture*, Woodbridge: York Medieval Press, 2010.

95 在其他地方苏措旺姆（សុខជនុវិមុន）被写作苏措哇（សុខុវិណ៍）；在《贡塘王统世系》中仅用一行字提及曲吉准玛，并忽视了后者在印刷出版中所起的作用。

的地位，使其成为和平与调停的促使者，当她们与男性宗教上师没有进行宗派斗争，以及不涉及赞助竞争时，她们常常与作为强有力调停者和交涉者的男性宗教上师联手⁹⁶。

传记叙事在佛教背景下，传播道德榜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女性佛教徒的一生作为被“认可的标杆”，在后世人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⁹⁷。除了几部女性传记外，题记和有关赞助记录，有时也包含这一方面强有力叙事。由于缺乏上下文信息，它们的内容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人们在相关时代背景中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且可能通过当地的口传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印刷出版图书似乎为妇女提供了一个实现其宗教理想、为过世的家人积累功德的重要途径。考虑到妇女被视为强大且合法的统治者，要比男性难得多，但有时投入印刷出版，能够加强妇女的宗教形象，巩固政治地位。

为数不多的妇女以批判的方式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更多女性作为尼姑和赞助者找到了破坏性较小的方式来实现其愿望。充当施主常常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有回报，且问题较少的方式来参与佛教活动⁹⁸，从而有助于实现其愿望：给她们提供了撰写新的宗教著作、为抄经师和雕刻师提供食物、筹集制作宗教物品所需材料，建立一个作坊所需的经费。我们只能从典籍文献的结尾部分，看到简单地提及她们作为施主的名字，才能了解到她们所做的贡献。并不是专门描述其生平的资料残卷，和少量资料很难收集到相关信息。即使我们不了解她们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充当佛教施主的方式，直接参与亲属关系以及宗教、政治网络来实现其应有地位。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使我们想起许多在欧洲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充当施主的历史，这些妇女支持传播书籍文化，以及大量的各种宗教传统教育，成为了教育和学术的中心。在中国西藏和欧洲传统中，这些妇女的遗产在诸多相关传统，以及她们所取得的成就中得以继续存在，在男性世界中的妇女对相关传统及成就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玉珠措姆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海德噶·丁伯格 剑桥大学蒙古内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⁹⁶ 费尔南达·皮雷尔运用安多地区的民族学资料，详细地分析了上师们在调停纷争中的作用。她对此的一些反思可以被视为与历史语境相关的。

⁹⁷ Janet Gyatso and Hanna Havnevik, *Women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52. Hildegarde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1-394.

⁹⁸ Janice D. Willis, "Nuns and Benefactresses: The Role of Women and Philosophic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Yvan Yazbek Haddad & Ellison Banks Findly eds., *Wome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59-85.